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汕头大学文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联合出版

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 | 卓新平 卢龙光 总主编

民国时期 非基督教运动 重要文献汇编

唐晓峰

王帅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汕头大学文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联合出版

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 | 卓新平 卢龙光 总主编

民国时期
非基督教运动
重要文献汇编

唐晓峰
王帅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唐晓峰,王帅编.—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097-7551-6

I. ①民… II. ①唐… ②王… III. ①基督教-文献-汇编-
中国-民国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7480号

民国时期非基督教运动重要文献汇编

编 者 / 唐晓峰 王 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范 迎

责任编辑 / 范 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8.25 字 数:619千字

版 次 /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551-6

定 价 / 16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序

卓新平

基督教的“中国化”是基督教在华发展极为关键的举措，但这一历程是复杂曲折的，人们对其意义的认识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迄今仍然存分歧。因此，在当前大力推动基督教“中国化”发展的关键时刻，很有必要回溯基督教在华传播和逐渐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找出中国基督教当代存在及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最佳途径。这就是“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自唐代基督教传入中华，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发展，与中华文化及在中国大地呈现的各种外来文化产生了交往、碰撞、对话或融通，这构成了中华文化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内容，基督教本身也在这潮起潮落、跌宕起伏中沉浮、拼搏，既想保住其本真，又需获得其新生。这一经历使基督教在华历史充满戏剧性和冒险性，也使之命运多蹇、变幻莫测。从唐朝景教的亮相开始，基督教有着四次传入的史话，也有其多次被禁、消失、尘封的遭遇。而从最初的“文化披戴”到如今越来越深入的“文化融入”，基督教在华的形象也在不断改变，其对中华文化的体悟和认同更是越来越深刻。

在这种相遇与冲突、误解与领悟、存异与求同的双向互动中，基督教在中国面对着各种问题，寻求着可能解答，并没有停止其摸索、放弃其努力，“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的各卷实际上就反映出这一心路历程，记载着其理论探究。在此，许多重要议题都被涉及，如“普世性”与“地方性”、“西化”与“华化”、“求同”与“显异”、“上层路线”与“底层联系”、“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中心”与“边疆”、“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先知”与“仆人”、“役人”与“服事”、“洋教”与“本色”、“合一”与“分殊”、“中华归主”与“主人中华”、

“对话”与“对抗”、“政治”与“宗教”、“启蒙”与“拯救”、“文化侵略”与“文化交流”、“因循守旧”与“与时俱进”、“爱教”与“爱国”、“爱己”与“爱人”、“依附”与“自立”、“去中国化”与“中国化”、“传统”与“现代”、“旧制度”与“新文化”、“个人灵修”与“社会慈善”、“流俗”与“更新”等。在这些思考中，一些传教士从西方宗教的宣传者变身为中华文化的研习者，一些西方中心论者开始反思并批评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还有一些欧美神学的推崇者转化为中国神学的探索者。当然，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对抗与争辩、纠结与博弈、分殊与分道等也一直存在着，这些思想分歧、理论交锋、乃至文化冲突也都在“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中有着生动的表述、得到真实的写照，留下了宗教文化交流曲折发展的深深印痕。而我们阅读这些栩栩如生的历史文献则并不指望能马上抚平历史的痕迹、治愈冲突所造成的创伤，其更为重要的则是激励我们去冷静洞观、深刻反思，由此来对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加以展望、对其拨乱反正的途径加以梳理、并对其更好的前景能有充满信心的期待。

以史为镜、洞若观火，以史为鉴，登高望远。以鲜活的文字、透彻的史实来观古悟今，不是要让我们仅仅发思古之幽情、叹往事难回首，而是要使我们从历史之波折、交流之坎坷中看到对未来的希望，走出艰难岁月，以历史的厚重积淀来促进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使之达到在我们今天中华文化更新与重建中的积极超越。对此，研读“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迪和必要的深思。

“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序

卢龙光

自基督教以景教之名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首次进入中国以来，已经历了将近14个世纪。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景教在唐朝曾达到“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可惜好景不常，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崇道灭佛，殃及景教等外来宗教，因而结束了景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210年历史。究其主要原因，乃是景教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自己的身份，无论所用以论述信仰之语言、教士之装束及所建立宗教场所之样式皆借自佛教，在佛教被灭之时只能被视为同宗而遭同一待遇。其后在元朝时期来华的也里可温，涵盖了景教和天主教，由于没有跟以汉族为主流的社会和文化建立关系，也在1368年跟着元朝的覆灭而消亡。

基督教在中国持续性存在的历史源自西班牙人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他在1551年从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到中国广东上川岛，因明朝海禁而无法入内地传教，他在1552年便死在岛上。因他的感召，耶稣会会士分别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前来中国，在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1552~1610）从澳门到达广东肇庆传教建堂，开展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历史，并且透过利玛窦等人的努力，将西学传入中国，亦将中国思想文化知识带入欧洲，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碰撞、冲突、共融的大门。明代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先后受洗加入教会，但同时亦引起一些上层人士的抵制和反对。清朝康熙皇帝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吸引而重用一些学有专长的西方传教士，但由于天主教修会和传教士内部之争而引发了“礼仪之争”，并因而发展成罗马教宗和中国皇帝之间的权威之争。1715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颁发《从这日起》通谕，宣布在华的传教士和天主教信徒不可祭祖。这激怒了康熙，他遂宣布禁教及驱逐传教士出境。自

1723 年雍正登基后，更开始了清朝百余年的禁教。不少中国的天主教徒从北方往南逃，甚至隐藏在深山之中，直至 19 世纪，才再陆续开始公开活动。基督新教的首位传教士马礼逊，在 1807 年抵达中国，就是基督教第四次进入中国的历史。而这段历史，与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重叠，部分西方传教士更成为中国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时的翻译者，同时也带来了最新的西方教育、科技、医疗、慈善事业、哲学等。在中国人民经历历史剧变，为自身寻找民族的出路和文化更新方向的历史时刻，基督教既是敌人又是朋友。

在基督教和中国的相遇历程中，产生了不少文献，记载了在不同时段中，双方不同类型的接触，包括怀疑、质疑、误解、争辩，也有欣赏、领悟、反思、启发。这些文献不但反映了历史的经验，更可作为今天仍在进行中的互动交流的重要参照。

“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正是要将一些分散在不同出版物的重要文献按照不同历史时期和性质汇编在一起，不但便于阅读和研究，更避免因历史久远而散佚。

为了出版这汇编，唐晓峰博士作了很大的努力，我们谨致以感谢，期望这汇编能够促进基督教在中国植根、发芽、成长并结出花果有所贡献。

编者说明

本书主体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教外人士对基督教的评价及批评；第二部分是教内人士的回应及反思；第三部分是在非基督教运动期间发表的重要宣言、文件；第四部分为非基督教运动文章附录。每一部分的文章均以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每一篇文章前均撰有编者按，以方便读者了解作者信息及文章的写作背景。附录部分论文题目是编者已经收集到的，但未选入本书的文章目录，附录于书后，方便读者查阅。非宗教运动期间，许多有价值及有参考意义的文章，或因编者拣选标准、或因编者眼界及能力等原因未能编入此书，甚至在目录中未曾提及，望读者诸君多提宝贵建议，也请体谅到这不是一部穷尽该主题所有资料的书。另外，值得说明的是，因能力及时间所限，本书只收录了基督新教人士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的部分文章，天主教人士的回应论文将另有文集收录。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副研究员唐晓峰博士和王帅博士共同编写，原始资料有赖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琦研究员对于“非基督教运动”这一主题资料的收集工作，编者在此基础上，予以一定的扩充及摘选。这里编者向段琦研究员深表谢意，她为这些资料付出了近20年的努力和心血，没有她的努力，这项工作根本无法起步。同时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范迎女士的大力协助，没有她的努力，这本书同样无法与读者见面。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将原文献的繁体字转换成了简体字；为了尽可能地再现文献的原貌，同时也展现白话文的演进过程，以及每一位作者的表述习惯，我们保留了原作的表述方式，而没有按照现代汉语的表述规范进行更换，或进行统一，因此书中会出现一些看似“错误”的字词、标点，以及不一致的现象，这并非印刷和校对错误，而是“有意为之”，诸如此类的表述有：“澈底”与“彻底”、“那里”与“哪里”、“那末”

与“那么”、“一例”与“一律”、“馀”和“余”、“一部份”与“一部分”，等等。另外，本汇编中诸多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表述均用省略号代替，个别原文无法辨识的文字用方框取代，由此为阅读带来的不便，敬请读者谅解。

序 对于非基督教运动的几点宏观认识

唐晓峰

非基督教运动发端于1922年，如今已经过去90多年的时间，一个半甲子对于历史长河来说，莫过于一滴水，但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90年何止于此，它蕴育着中国人太多期盼中的及想不到的巨大变迁，政治上的、文化上的、经济上的、思想上的……对于1807年才进入中国的基督新教来说，90年意味着它的近半旅程，在此过程中，其在中国的存在及发展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教方式的转变、信徒人数的剧增、分布范围的日益广泛、蕴含问题的凸显。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整理有关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文献，再次走入当年那个“非基督教的世界”，品读“被非者”的心境时，它会带给我们哪些全新的认识和启迪？尤其当历史照进现实，这种历史的参与与品读参照于基督教在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处境及处境中的发展时，我们应该做哪些回顾和反思？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让90年的历史与现实一起在同一空间展开，历史与现实一起活在当下。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编者有着一些阅读体会，在这里拿出来与读者共享，希望对读者诸君参阅此书有所裨益。这些体会是关于非基督教运动整体的，至于个中细节，还请阅读具体文章，或参阅相关研究书籍。

一 非基督教运动并非一个偶发的运动

学界普遍认为非基督教运动肇端于1922年3月，当时清华大学即将于4月4日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该举动引起了国内青年学生及部分知识阶层人士的不满，他们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和“非宗教大同盟”反对基督教，进而发起了此次运动，看似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此次大会诱发了非基督教运动，但事实远非如此，该事件只是国内酝酿已久的反基督教风潮的导火索。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基督教（含天主教）

便遭到了众多新文化运动精英的抨击，王星拱、李石曾、恽代英、朱执信、周太玄、李璜等人都曾撰文批判宗教信仰，并将矛头直指基督教，本书所辑录的朱执信的《耶稣是什么东西》便极具代表性。这些文章虽少有非基督教运动期间那种“意气风发”的语调和非理性的言论，但言语之犀利程度、攻击之彻底程度较非基督教运动所为有过之无不及，对此，当时基督教界亦针对新思潮及学者们的批评做出反思和回应，比如徐宝谦等人针对新思潮的发展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基督教新思潮团，即北京“证道团”，并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出版《生命》月刊，对学界做证道的演说，组织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讨论会、按讨论的结果共同促进社会服务，之后徐宝谦还发表了《基督教与新思潮》系列演说和文章；在此过程中，针对新思潮运动对基督教的攻击，刘廷芳、简又文、赵紫宸等人均对基督教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处境进行了反思，对于融合新思潮及基督教做出了种种尝试，并针对新文化运动阵营的批判做出了回应，对此本文集均收录有相关文章。另外，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周作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知名学者都曾撰文评论中国社会及文化中的基督教，虽然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但总体上能客观看待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正负社会功能，肯定基督教拥有的道德教化功能，否定教会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罪行。

综上所述，早在非基督教运动之前，思想界便酝酿着针对基督教的各种主张及基督教界的种种回应，其热烈程度丝毫不逊于非基督教运动期间的种种讨论，我们完全可以将非基督运动视作这场讨论的延续，只不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成立及其通电成为这场运动正式命名的标志。其实，再进一步向前推，自天主教进入中国起直到20世纪初期这300多年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始终受到中国官绅及大部分民众的排斥、反对，民间潜在的非基督教运动长期存在，对此许地山曾撰写了《反基督教的中国》系列文章追溯这段历史。当然，上述论点并不代表我们否认1922年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赋予了反基督教更多的新的内涵。比如之前的反对更多强调的是文化上的龃龉、与列强的勾结，以及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冲突，而此次非基督教运动除明确、凸显上述反对立场外，还容纳了反资本主义、反有产阶级、反不平等条约、收回教育权等诸多主题，对于这些立场和主题，非基运动给予直接的明确与强化，一度把新文化运动中理论的探讨升级到主义之争、民族身份之争、国家认同之争，虽没有演变成义和团时期的暴

力冲突，但却充满言语暴力，蕴含一触即发的“武斗”倾向，只不过此时的冲突因为上层统治者的宗教立场的不同、政体的不同、文化形态的变化及发动群体的不同，而没有付诸暴力的实践。总之，中国的反基督运动自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进入中国的那一刻便已开始，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拥有了更多的思想文化内涵，而1922年以来的非基督教运动只是将这种潜在的反基督教运动加以明确化，因此它是一场必然的运动，一场由1922年那次偶然的基督教学生同盟世界大会而促发的必然的运动。

二 非基督教运动不是单一的运动

我们谈论非基督教运动，在狭义上可以将其视为针对基督教、基督徒、基督教会团体所发起的反对运动，但如前所述，它的发生绝不是孤立进行的，我们必须将它与新文化运动、反帝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非宗教运动等思潮联系起来加以评估，应该把它置于整个中国的文化传统及其变迁、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乃至国际形势、当时中国的政治意识生态之中加以裁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属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强调将一切既有事物的价值按照科学和理性的原则加以重新估定，不可墨守，不可盲从。按照科学和理性的原则，不但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宗教接受了审判，同样地，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在西方逃脱不了科学主义、实证分析哲学的攻歼，在中国亦免不了被审查的命运。结果可想而知，与中国的传统儒释道信仰一样，基督教的教义、神学亦被当作迷信、邪说而加以唾弃。在非宗教运动兴起的同时，非基督教运动也自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面对新思潮的攻击，西方出现了强调伦理性、道德性、充斥理性特征的自由派神学思想，而在中国亦出现了大批融合基督教与新思潮思想的基督徒思想家，比如赵紫宸、徐宝谦、刘廷芳、谢扶雅等。

20世纪初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行为，并没有因为五四运动的兴起、国民政府的成立以及北伐战争的进行而有丝毫收敛，它们仍在各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享有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种种特权，这其中便包括传教的特权，帝国主义的侵略让本来就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中国局势雪上加霜，知识阶层及民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怨气很容易便转嫁到受其庇护的传教权、教育权及由此而带来的教会、信徒及教会事业之上，各类非基宣言直接将基督教的传教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联系起来，将其视为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的急先锋、帮凶、走狗，而教会的教育俨然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基督教会在当时与境外的种种联系、境外对于基督教的资助及对教会教育权的实际控制、个别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所扮演的帮凶角色、部分传教士及信徒的素质与修养、基督教自身具有的洋教色彩等原因让基督教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反帝浪潮中主要的对象之一。

此外，研究非基督教运动的学者在读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之后，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基督教不但违背科学、理性，在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成为其帮凶，而且更被当作资本主义、有产阶级的代名词，宣言强调：“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有掠夺阶级，他方面有被掠夺阶级，被压迫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宣言亦强调：“‘世界基督教青年同盟’……所讨论者，无非是些怎样维持资本主义，及怎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把戏。”该宣言最后更是发出这样的号召：“学者诸君！青年诸君！劳动者诸君！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底罪恶，我们谁不知道资本家底残酷无情。现在眼见这些资本家走狗，在那里开会讨论支配我们，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另外在其他几位反基督教运动的人士那里，基督教会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勾当更是屡屡被提及，比如，陈独秀在他的《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一文中直接批判基督教及其青年会向资本家俯首摇尾，与资产阶级沆瀣一气。值得注意的是，为教会辩护的人士也往往试图撇清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强调基督教的平民性及现实中对于无产阶级的帮助，甚至还谈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种种关联，这些在非基督教代表人物的言论中多有表现，甚至在立场颇为强硬的张亦镜的文章中亦被多次提及。从这些言论来看，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潮深深影响了新文化运动乃至非基督教运动阵营，似乎成为一种时髦、流行、强势的话语，连基督徒阵营的辩护者都不得不采纳其观点为自身辩护。在此，非基督教运动似乎又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之，我们很难将非基督教运动定义为科学主义运动、理性主义运动、反帝运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但我们的确应该从这些社会思想运动的大背景之中来看待非基督教运动的产生及发展。

三 非基督教运动是多阶段的运动

理解非基督教运动离不开思想文化背景，离不开社会政治背景，同时亦离不开具体历史社会事件的发生及演进，“非基督教运动”便随着这些具体的、偶发的社会事件而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非基督教运动”自1922年3月，由上海学生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通电，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即将于当年4月4日在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大会时起，一直持续到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五年多的时间，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直接目标在于反对该次会议的召开，进而反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24年。1922年2月26日，上海学生以“反对基督教为宗旨”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后，3月11日，北京的知识分子响应上海的号召，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3月21日，由李石曾、李大钊、缪伯英、朱执信等79位文化名人以该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直言“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3月31日，由周作人主笔，北京大学的五位大学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原则，反对对基督教进行攻击，贺麟亦发表文章认为，研究基督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学校如期召开，同日，李石曾、李大钊等12位学者在《晨报》上发表《非宗教者宣言》。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萧子升分别发表文章，批判宗教。4月8日，大会闭幕的当天，北京大学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教会学校的教育与宗教分离。6月，非宗教同盟编辑出版罗章龙编辑的《非宗教论》一书，辑录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萧子升、周太玄、朱执信、罗章龙等人撰写的31篇批判和否定基督教的文章。之后，第一阶段非基督教运动逐渐趋于平淡。对于此阶段非基督教运动的进展，教会人士亦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应，1922年4月10日，简又文等5位基督徒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对于非宗教运动的宣言》，认为非基督教运动违背科学精神、破坏信教自由原则、于社会改造无任何建树可言。刘廷芳亦向周作人、张东荪、胡适等人约稿，以《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为题，发表在《文社月刊》之上。张亦镜、梁均默等人亦在《真光杂志》上撰文

驳斥非基督教运动的主张，这些言论收录在《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全编》《最近反基督教运动的纪评》等文集中出版。青年会书报部也出版《现代思想中的基督教》《非基督教运动平议》《教会觉悟与非基督教运动》等丛书对非基督教运动进行回应。

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二阶段从1924年开始，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加之共产党在此阶段非基督教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理论的指引，使此阶段的反基督教运动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所兴办的教会教育机构。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学校（The Anglian Trinity College）发生学潮，要求学生自治的权力，同时亦引发了以收回教育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该运动迅速由广州扩展到湖南、湖北、河南、江苏等地。“收回教育权”运动得到了教育界及基督教界的普遍关注，这些观点和主张将在“基督教中国化”丛书系列中，以“基督教教育”为主题编辑出版。1924年8月，在国共两党的支持下，新的“非基督教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同盟由柯柏年、吴稚晖等人发起，共产党员唐公宪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同盟出版有《非基督教特刊》，并在当年12月“圣诞节”期间，策划了“非基督教周”活动，该活动在上海、广州、武汉、苏州、杭州、绍兴、宁波、长沙、济南等地得到响应，其间很多传教士和信徒受到围攻，一些教堂、教会学校设施遭到损毁。此间基督教亦针对此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进行回应，他们针对“收回教育权”运动发表了大量论文，多持支持的态度，但对于他们与帝国主义之间联系的指控，教会学者此阶段研究的重点因多在本色教会的建设上，而无暇多顾，或者他们认为与国外的联系是不争的事实，似乎建好本色的教会便是最好的回应。

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二阶段浪潮刚刚过去，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中国民众反帝运动浪潮再次兴起。基督教会再次首当其冲，很多地区的宣言、决议均把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再次加大反基督教的宣传。基督教阵营此次针对“五卅惨案”反应强烈，各地基督徒团体、组织、个人，乃至个别外国传教士亦纷纷发文，对帝国主义的残酷行径予以抨击。第三阶段反对基督教的浪潮一直持续到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多被占用或毁坏。在1927年3月，甚至还发生杀害六名传教士的“南京事件”。1927年国民

党建立南京政权之后，开展了“收回教育权”运动，随着外国传教士人数的下降、教会学校教育权的收回、中国教会进行的本地化的努力及国共两党之间矛盾的激化，非基督教运动逐渐削弱，直至平息。

四 非基督教运动各方观点立场多样

谈非基督教运动中的各种观点和立场，首先应该区分两大阵营：一是教外的人士，二是基督教界内部人士。以往学者多从“非基督教运动”的发起者这一阵营单方面谈论非基督教运动，忽略了基督教阵营对于此次运动的回应。事实上，基督徒的言论及实践同样构成此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非基督教阵营产生互动激荡的作用。当然，简单做上述区分还远远不够，因为教外的人士也有“非基督教”和“非非基督教”的区别，从“非基督教”人士的角度来看，他们批判基督教的角度亦十分不同，有从教会教育角度着眼的，有着重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侵略的，有从违背科学、理性的角度加以攻击的，还有从现实实践的角度进行批判的，更有一些凭着各种“口号”“主义”直接扣帽子的言论，这些批评者有的是国家主义的坚守者，有的是共产主义的倡导者，也有来自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而在教外的“非非基督教”者的论点也多种多样，他们或认为批评者的言论出于意气，缺乏事实根据；或认为这种批判有违信仰自由的原则；或认为批评者忽视基督教在历史和现实中对于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对于人类道德、文明人格的培育作用，对于教育、医疗事业的促进；或认为宗教为人类所必需，基督教在其中尤其起到慰藉人心之功能，种种观点不一而足。

而对于基督教阵营的回应者来说，有的学者主张面对批评，基督徒应该反省、自修，应该将自己的信仰按照批评者的批评加以逐一审查，有则改之，无则阐明事实，其中简又文、顾子仁、徐宝谦、刘廷芳、赵紫宸均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者；有的人则反唇相讥，将所有的批评皆条条驳斥，这一派主要以张亦镜、梁均默为代表；亦有研究者直接探讨基督教与新思潮的相容之途，探讨基督教的本色、处境之路，试图摆脱它与蒙昧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排他主义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非基督教运动的上述立场和观点，并非截然对立与分殊，往往各种观点兼而有之，个人的思想亦时有反复，非基督教运动的倡

导者也有肯定基督教信仰之处，而基督教界亦有认同非基督教界之批判者，其他中立者亦有两派观点兼而有之者，对于非基督教运动的各派主张千万不可一概而论。

五 非基督教运动促进了基督教的“中国化”

在整个非宗教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过程中，虽然基督教成为众矢之的，非基督教者的目的绝非协助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良性的发展，甚至可以用“置之死地而后快”来形容，但这些非“善意”的批评及个别文化名流对于基督教的客观评论让当时的中国基督教界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机遇，这种重新发展虽无法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但起码让中国的基督教脱去了“洋装”、放弃了“西餐”，走上了一条“中国化”的发展之路。这种发展也是导致非基督教运动逐渐走向平息的原因之一。新的转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自1922年开始，也就是非基督教运动开始的同一年，中国教会界亦开展了本色教会运动，当时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正式提出了本色教会的口号。大会产生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成立大会上，协进会会长诚静怡曾强调：“当今举国皆闻的‘本色教会’四字，也是协进会所提倡。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时间中，本色教会一直是中国基督徒思想家关注的话题，这一运动虽可追溯到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但此时因为非基督教运动的促发，而变成中国基督教界整体的、有组织的、明确的行为，教会界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均参与到本色教会理论的论证和构建中。对此，“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还将编辑“本色教会运动”文集出版。中国教会界开展的“本色教会运动”虽看似回应非基督教运动的被动行为，实则为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中生存、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必经之路，只不过非基督教运动促发了中国教会的反省、修正意识，推进了这种本色化的实践进程，这一进程对于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来说影响深远，当前中国教会神学的许多思考都可从那时得到追溯。第二，教育权的收回。1919~1926年，各列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达15000所，学生80万人。如此数量庞大的教会学校既不向中国教育部门立案注册，也不许中国教育团体干预。其教育权游离于国民政府之外，完全控制在西方传教士手中。西方传教士任校长、聘任教师、安排课程、